

在文明高度发展的古代社会，尤其是在东亚，中国一直被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四周则称夷狄之邦。这种严内外之分、明华夷之辨的文化使命感，曾让中华民族引以为豪。晚清之际，这种文化的优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以来，西人东进，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先受挫于英法，中英《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圆明园被野蛮焚毁，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所打败。亡国、亡种的焦虑代替了理性的价值评判，富国强兵成为压倒一切的最终目的。

□ 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



□ 中国最美古村

大梁江村： 隐于太行山的大院

王锦强 文/图



大梁江村位于太行山腹地——河北井陘县西部南漳城镇的一处山沟里。据考证，这里唐时即有人居住；明万历年间，山西平定城西村梁氏家族迁居于此，渐成村落；清代梁氏家族繁衍壮大，村亦名之“大梁家”。大梁家栖居缺水山区，出于对水资源的渴盼，后更名为大梁江。大梁江村拥有太行山区保存完好、特色鲜明的明清古村落建筑群，保存完整古民居院落162处，房屋3000余间。这些民居依山就势，高低错落，兼有北京四合院格局和冀晋民居传统构造形式。

大梁江村群山环抱，周围山体是一道天然屏障。其民居多为石头建筑，部分辅以砖木结构，建造形式色调简洁、粗中见细、朴中带雅。民居院落使用石砌或砖砌外墙，不仅防御性能好，而且构造合理。这种院落形式在冬季抵御寒风之余，还可吸收春秋季节的阳光，同时还能调节夏季的气温舒适度。山区民居建筑将厚重石块加工规则后，采用当地石灰灰缝黏合，屋顶采用薄而宽的石板铺盖，房屋窗格楞使用木材，与石材搭配形成石头房屋建筑形制。石、砖、木“三雕”精细华美，有富贵之气，具有较为典型的晋商大人家私宅特点。

历史街巷是古村落的精髓，是体现传统村落品质的标志性公共建筑设施。大梁江村共有上街、下街、中街3条街道、10条巷子，总长3700多米，全部用青石和卵石铺成，井然有序，四通八达。在街巷，抬眼可见古色古香的石雕、门楼与斑驳的院落墙体。

武举大院在大梁江村称得上是鹤立鸡群。其体量最大、气势最宏伟、构造最讲究，还有点戒备森严的气氛。大院因清乾隆年间，梁氏后裔梁深考中武举人而得名。梁家四代有功名，三世出名医，享有“武魁”“清正流芳”“誉满杏林”之美称。大院门上悬挂“武魁”匾额，当地俗称“一宅九院”。大院占地两亩，9个四合院各有门户，又互相连通，房屋100余间。其所有房屋呈“奎”字形结构，层楼叠院，精巧雅致。在大院门前有一方校场，传说是习武之人——房主梁深当年的运动场。门侧石头上的斑斑点点印痕被想当然为梁深练功，天长日久手指具有深厚功力的见证，也为梁家武功上取得成就留下更多的说辞。9个楼院既互相独立，又彼此相通。进正门或旁门，都能走遍九重院落。整个院落，院中有院，院里有楼，楼上有楼，楼顶有院，楼能通楼，院能通院，攻防兼备，是我国北方较为罕见的四合院院群，被称为“深山里的豪宅”。

大梁江村的民俗文化韵味非常浓厚，至今仍保存了各种传统习俗展示空间和祭祀场所。古戏楼、古庙宇气势不凡。但乡村村民宅精湛建筑连片的地方，公共建筑更不含糊。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的古戏楼是村里村外看戏的热闹场合，首剧在这一带很受欢迎。龙王庙、岱王庙、关帝庙、老母庙、奶奶庙等庙宇是就地取材的特色人文范例，也是太行山区古村信仰文化的代表性建筑群落。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村中一棵据说栽于唐代的千年古槐树。槐树树心部分已腐朽，树皮活泛，树身摇摇欲坠。村民们用拱形牌楼支撑树身，老树得以枯木逢春，延年益寿。从中也可领悟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

大梁江是一部石头民居的教科书。在一个大山深处的穷乡僻壤间，遗存了这么多令人荡气回肠的村落民居建筑文化遗产，靠的不仅仅是武艺、武功和武德，在崇文重教、智慧修为等方面更能体现造屋者的远见卓识和内在品格。所以，文武兼备才是大梁江人志存高远的功课涵养和发展方向所在。包括大梁江村在内的太行山人家，开天辟地，不仅是武出举人，文出监生，当今更是人才济济，在太行山上经年累月打磨出一个个绚丽夺目的乡居文化样本。

中国艺术研究院与黔西南合作

扶贫搬迁中深化“非遗”研究

陈晓星

文化扶贫如何融入地方建设？中国艺术研究院日前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签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扶贫合作协议》，在黔西南实施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将对其“非遗”项目展开研究，组织专业培训，设立教学研究基地，转化“非遗”成果，扩大文化扶贫的实际效果。

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张政介绍，黔西南州各族群众在大山里生活了千百年，创造出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为丰富。为了保护好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黔西南州在搬迁过程中专门对搬迁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统计分类，记录保存。此次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将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一起对搬迁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度挖掘整理，让搬迁地区的民族文化得到传承，让搬迁的群众依靠民族文化资源就业创业，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住得好。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锡表示，从更深层次上看，扶贫的关键是要精神扶贫、智力扶贫、文化扶贫。文化扶贫是从文化和精神层面上给予贫困地区以帮助，从而提高当地人民素质，尽快摆脱贫困。文化扶贫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扶贫工作的效果，是促进扶贫由输血向造血转变的重要因素。

“年华未阑”：文化的反思与会通

罗剑波

近代华夷之辨的文明变化

面对西洋文明的强烈攻势，往日的“华夷之辨”演化为近代的“中西之争”，名称改易的背后隐藏着文化心理的巨大转变。洋务运动的失败，刺激了国人由器物层面到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1896年，严复在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提及他写《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的原因时，也强调“溯源竟委，发明富强之事”。显然，在对富强的急切期盼中，近代知识精英接受了这种隐含文化霸权的思想。

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某种程度上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渐渐丧失的历程。晚清文人对中华文化的怀疑日渐加深，对西方文明的崇拜日臻极致。有人将传统文化看作近代化的绊脚石，主张一切风俗惟西方文化马首是瞻。

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晚清政府和精英们不断地兴工厂，造铁路，行宪政，改官制，翻译西书，选派留学生，暂且不论其实际与效果，却将西风越煽越劲。民国肇建后，兴共和政体，改满清旧俗，而局势并未得到改观。

若说国家沉疴日重，而向西方寻求救治良方已数十年，至此仍未见奇效。民主革命并未带来人们所期望的结果，反而带来了更多的动乱和更大的失望。胡适悲观地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正是在这种“百事不如人”的心理暗示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了“全



盘西化”的浪潮。

“全盘西化”的代表人物陈序经说：“救治目前中国的危亡，我们不得不要全盘西洋化。”在这种思想的映照下，传统典籍、节日风俗、语言文字等中华民族曾经引以为豪的传统文明，也在向西方狂奔的路上被弃之如敝屣。

现代国粹主义的文化反思

对于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来说，曾经辉煌灿烂的文化是其民族内心最深层的骄傲。如果说西化的根本目的在于挽救中国于危亡，那么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之所以为中国，首先在于其文化的独立性与自足性。

在这个层面上，“全盘西化”浪潮与救亡的目的也不乏南辕北辙之嫌。由此思路，章太炎提出了“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的号召。近代国粹派的产生，使得西方文化至上论受到冲击。他们试图“以西方学理为烛，照亮国学之精义”。试图打通中西，以中证西，进而昌明国学。在此之际，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再度树立起文化的自信心。辜鸿铭在《春秋大义》中还给欧洲人开出了具体的药方：“西洋文明不成。为欧洲人的前途计，应该接受我们中国的精神文明，应该欢迎我们中国的孔子之道。”

这也正映照出当时国人面对西方文化的两种思路，即严复所言“不为无理偏执之顽固，即为逢迎变化之随波”。当复古资源不足以支撑文明体系时，西方文化成为了革新的方向。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使之互相融合，并朝着既定的变革方向发展，也成为了重要的时代命题。

时移易易，今日中国已摆脱了当年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而如何协调中西文化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只是这一工作今天可以更为从容和理性。只要我们仔细谛听百年前的声音，自有足资今天借鉴的地方。“会通”一派的声音就弥足珍贵。

当代中华文明的文化会通

“会通”一词，源于《易·系辞上》：“圣人以有见天下之功，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对此孔颖达释为“观其物之会合变通”。应该说，“会通”是中华民族可贵的思想资源，包容开放是其最重要

的特质，融会贯通是其最根本的要求。

在近代文明冲突与交流空前猛烈的时代，对于如何在老大帝国中重塑新型文化，就有人提出会通的理论：“凡国学微言大义，均可借西种之学参互考验，以观其会通，则施教易而收效远。”这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被视为重建文明的理性之举。“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是重塑文明的第一步。

所谓“会通”，意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就要绝对避免陷入“中体西用”的心态。在理论层面上，严复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在方法论上，钱穆也指出其中的要害：“实在也不知道中学之体是一个什么体。自己认识不足，在空洞无把握的心理状态中，如何运用得别人的文化成绩？”这恐怕也是今天文化建设须重新思考的问题。

中西文化皆自成体系，文化会通更要注意避免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根本性损害。如西方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其基本价值观念基础上的。对西方文明不加甄别地吸收的代价是中华文化的沦亡、消解。欲求会通，必先博观约取，为现世所用。

所谓文化会通，不是一种文化为主，他种文化为宾；更不是一种文化占绝对主导地位，他种文化只有被吸纳、被消化的命运。在急剧变化、观念多元的今天，没有哪一种文化观念与理论方法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以政治生活为例，中国2000余年的帝制固不足取，而西式民主难道就绝无瑕疵？

文化会通就意味着要打破对任何文化的绝对迷信，重新评价一切文化的价值。发掘传统文化中精华和现代资源，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与西方文化中，寻找合适的接榫之处，理性地衡估其是非优劣。在世界多元化的今天，在欧洲中心主义日渐衰微的时代，多元文化如百舸争流。奉西方文化即为世界文化的时代，也已一去不返。处于此际的中华文化，自然不必如百年前那般妄自尊大，去羡慕西方的蓝色文明；也不宜文化自大，自弹自唱。

文化会通的意义在于全面展现华夏文化中海纳百川的气魄、永无止境的气势，是其他文明的优长映照进中华文化的母体，再造一个气势磅礴的新文明。今时今日，在新的时代关口，新型文化的确立，不仅要会通古今，也要会通中西。若能如此，“会通之大义矣哉！”

(作者为复旦大学副教授)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 汉字故事

“粥”字何来左右“弓”？

杨立新

粥，又称“糜”，是我国饮食文化的精粹之一。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以粥充饥了，据《汲冢周书》记载：“黄帝始烹谷为粥。”可见，粥与中国人的关系，正像粥本身一样，浓稠绵密，化解不开。

然而，不知大家在啜粥之余，面对袅袅粥香，有没有细思一下：“粥”字“米”的左右两边，为何各有一个“弓”呢？有一则谜语即由此而来：粥变米（打一四字成语），谜底为：左右开弓。

关于“粥”字，百度百科的解释是：“会意。从米，从二弓。‘米’指米粒，‘弓’意为‘张开’‘扯大’。‘米’与‘二弓’联合起来表示‘把米粒从左右两边同时扯大’。本义：用火和水把米粒体积增加到最大时候的米饭。”

查阅《汉语大字典》，“弓”并没有“张开”“扯大”的义项。显然，这种解释纯属望文生义，成了糊涂“粥”了。另外，2008年11月14日《光明日报》曾刊登李国文的杂文《文学的“粥化”》，文中就“粥”字有如下解读：“如今，把煮粥的办法运用到文学上来，几乎成为作家的手段……‘粥’字若没有其中的‘米’字，就是‘弱’。因此，弱化的作家，写出粥化的文学，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对此，《咬文嚼字》2009年第5期《李国文误说“粥”》一文指出：“‘粥’字去掉了中间的‘米’，怎么会是‘弱’呢？应是‘弱’字嘛。‘弱’少见应用，音jiàng，本义指弓有力，引申为‘倔强’。《说文·弱部》：‘弱，强也。’古人注曰：‘凡言倔强，当以弱为本字。湖湘间

称人之性刚不驯曰弱。’”

但是，这篇纠错文章与百度百科的上述解释一样，还是从“粥”的楷书字形上进行分析，并没有摆脱弓箭之义，仍然是不着边际。

“弓”和“米”，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为此，我们要从“粥”的字源上加以探究。下面是“粥”的字形演变：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粥”字最早见于金文，甲骨文尚无此字。由“粥”的金文可知，它是由“米”和“鬲(lì)”组成的会意字：



粥 米 鬲

鬲是古代煮饭用的炊器，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称其“三足皆空，中可容物”。我们再看“粥”的金文，下部为三个中空足，便于炊煮加热，象形意味很浓。由此不难推测“粥”的造字本义：把米放在鬲

中熬煮。

“粥”的金文尚无左右两个“弓”，它们出现在其小篆字形中。“粥”的小篆为“𩚑”，大家看，中间仍是上“米”下“鬲”，但两旁加上了屈曲上升的符号。相信您看后一定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煮粥时锅中冒出的热腾腾的蒸气吗？加“弱”表示米已成粥了。古人造字真是太形象了！



粥 米 鬲 弱

那么，两道蒸腾的水汽怎么会变成两个“弓”了呢？在此，我们就不得不提及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隶变。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汉字由小篆转变为隶书，从而结束了古文字阶段，进入今文字阶段。在隶变过程中，有些汉字字形不是按照常规演变的，而是产生了讹变。

在隶变中，“粥”字便发生了讹变。隶书误将小篆“𩚑”中的蒸汽状的曲线讹变为两个“弓”，同时省去下面的“鬲”，写成“粥”。同时，“𩚑”字仍然使用，作动词“卖”解，读作yù。



小篆 隶书 小篆 隶书

这正是：粥字何来左右弓？腾腾蒸汽鬲中冲。今文字古不同面，溯本探源觅旧踪。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通用规范汉字表〉8105字形音义源流研究》阶段成果)